

引 子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它事关国家的主权和整体利益，折射着一个民族的强弱兴衰、胜败荣辱，因而外交是辉煌、宏大，具有震撼力的。

外交是一门艺术，是智者们在友谊和利益的网眼之间，所编织出的一幕幕喜剧和悲剧，是实力和智慧的碰击与较量；有时只是在觥筹交错当中，举手投足之间，就改写了国家甚至人类的历史，因而外交又是微妙、细腻、变化莫测的。

正是由于外交的这种特性，每当一个新政权建立的时候，它的外交走向都要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出色的政治家、外交家们，就在这片颇具神秘色彩的天地里显尽他们的聪慧才略、大智大勇，翻腾起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国际风云，给世界带来强烈的震撼。

1949年世界再一次被震撼了。

这种震撼来自东方，来自一个崭新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当隆隆的炮声在东方古国的大地上回荡，当毛泽东这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和他的战友们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那些举着香槟酒为他们在二战之中的辉煌胜利而陶醉的将军们，那些站在世界版图前谋划着他们的全球战略、为划

分新的势力范围而勾心斗角的政客们，以及那些风度翩翩、已习惯了在异国他乡指手划脚的西方外交官们所感受到的是一种强烈的不安和沮丧。他们颇为沉重地关注着那片给西方列强带来巨大财富的“冒险家的乐园”。在这个东方古国最近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中，“外交”同“屈辱”一直是一对孪生兄弟。“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在地上办外交呢？”

西方列强早已习惯了这种模式，他们在企盼着新政权能够将这模式作为历史的惯性延续下去，哪怕仅仅给他们留下几分历史的回味也好。

为此，他们观望、威胁、诱惑，将“虔诚至极”的甜言蜜语涂抹在阴森恐怖的炮口上。

然而，他们彻底失望了。

所有的一切手段都没能改变崛起巨人全新的外交形象和既定的外交方略。

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位政治家、外交家能像毛泽东那样，将一个泱泱大国的外交政策阐述得那样形象、那样简洁、那样朴实无华却又耐人寻味：

毛泽东说：我们的外交要“另起炉灶”。

毛泽东说：我们要“一边倒”。

毛泽东又说：我们要“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新中国的外交，就在这简单、形象，甚至带有几分乡土气息的话语中开始了……

第一章

中共官方外交的开端

一、延安飞来美军观察组

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新中国由此以其崭新的形象正式登上世界外交舞台。而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到来之前，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官方外交就已经开始了……

1944年7月22日是个晴朗的日子。

这天上午，一架美国空军道格拉斯 C—47 型运输机从国民政府临时首都重庆起飞，向着中国的北方飞去。

驾驶员罗伯特·卡姆皮恩上尉手握操纵杆，全神贯注地驾驶着飞机，在他的身边，是导航员和报务员。

这个机组已经在中国上空做过很多次飞行了，但是此刻，他们的神情当中，却隐含着几分往日飞行时所没有的兴奋。对大家来说，还没有哪一次飞行像今天这样令华盛顿、重庆和中共方面

倍为关注，因为今天的航程不同寻常，他们要飞赴的目标是一个美军飞机尚未涉足过，而且在很多美国人心目中多少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土地——陕北延安。

机舱里，坐着九位身着制服的美军军官。

为首的一位军官配戴陆军上校军衔。此人有五十多岁，矮矮胖胖，也许是因为这副体态和年龄的关系，显出一副憨态可掬的样子。他就是曾在美国驻华大使馆担任过陆军副武官，在美国陆军中颇负盛名的“中国通”戴维·包瑞德。

包瑞德在中国已有二十多年的经历了。他于 1892 年出生在美国中部科罗拉多州的矿业城市色恩垂。大学毕业后当了两年中学教师，然后到美军中服役。1921 年他随军驻扎在菲律宾时，申请接受了由美国驻北平的公使馆组织进行的中文培训，苦读了四年中文。完成学业之后，他进入外交界，先是担任美国驻华使馆的文化随员，后来曾一度作为情报官员，随美国陆军第十五兵团一起驻扎在天津。1936 年他前往北京，出任美国驻北平公使馆的助理武官。1943 年后他又到广西桂林美军司令部情报处任职。

今天，包瑞德肩负着一个在他几十年军旅及外交生涯中极不寻常的使命：受美国陆军中缅战区司令部的指派，作为组长带领美军观察组前往中共中央及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延安，任务是同中共高级指挥机关建立外交联系，收集一切有关日军及中共方面的情报，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潜在的战斗能力，以及其在战争中所能做出的贡献等作出估计，并就有关援助共产党，以提高他们战斗力等问题进行考察。

观察组总共 18 名成员，分成政治情报组、陆军情报组、海军情报组、气象组和营救组。今天同包瑞德一起的是第一批的九个人。

观察组借用了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称呼南部反叛各州的字眼“迪克西”作为它非正式的名称。对此，包瑞德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也许是考虑到这是一个能引起人们好奇心的名字，它暗示着

造反者的家园也是一个‘太阳永远照耀的地方’，就像几十年前相当流行的一段歌词里说的：‘他们所说的关于迪克西的东西是真的吗？’”

在观察组成员中，除了军方人士外，还包括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二等秘书、美军中缅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约翰·谢伟思等外交人员，因此，也就使美军观察组的延安之行，实际上成为美国方面与中共之间第一次官方的外交活动。

谢伟思的身材同包瑞德正相反，高高瘦瘦，一副精明强干的样子。同包瑞德一样，谢伟思也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对中国文化也有很深的了解。他生在成都，少年时代曾就学于上海沪美学堂，后返回美国上大学，毕业于奥伯林学院。1933年，他进入美国外交界，被派至美国驻华大使馆，并于1943年兼任美国陆军中缅战区司令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

飞机在西安加油之后，继续向北飞行。

陕北高原已展现在眼前。

中午时分，飞机飞临延安上空，透过舷窗，可以清楚地看到延安宝塔和延安机场上迎接的人群。

为了迎接美军观察组的到来，延安机场刚刚进行了整修，虽然非常简陋，但却显得干净整洁。

在飞机跑道旁，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等望着天空，等待着飞机的降落。

飞机在延安机场上空盘旋了一圈之后，开始降落。

飞机降临跑道，向前滑行，带起一阵昏黄的尘雾。

突然，飞机剧烈晃动起来并向一侧倾斜下去与此同时左边的螺旋桨猛然打向地面“咔”地一声折成了两截其中的一头“咚”地一下戳在机身上，直插进驾驶室。

飞机嘎然而下。

站在跑道外迎候的人们被这意外的情景吓了一跳。

叶剑英等赶紧跑上去察看。

原来 由于刚刚修整过的机场跑道地基不牢，飞机滑行时轮胎陷进了地面，造成了这个小小的事故。

此时，包瑞德等已从飞机上下来，脸上多少带有一些不安之色。幸运的是，除了驾驶员卡姆皮恩上尉手上受了点轻微的擦伤外，大家均安然无恙。

叶剑英迎上包瑞德 关切地问：“飞机坏了没有？”

包瑞德笑笑 用中文答道：“伤人乎 莫问马。”

此话原出自《论语·乡党篇》，一句巧妙的用典，一句幽默的回答，把紧张气氛化解了许多。

虚惊之后，包瑞德等整整军装，同上前迎接的周恩来等见面，并介绍了他的随行人员。

周恩来同大家一一握手，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

随后，大家登上一辆军用卡车，向观察组的驻地进发。

观察组的驻地是延安交际处所属的几间窑洞 每人一间 里面有一张木板床，一套桌椅，一个搪瓷脸盆和一个毛巾架。陈设虽然非常简单，但却收拾得干干净净。美国人对这种别具风格的住所感到非常新鲜。

吃午饭的时候 由朱德总司令致了一个简短的欢迎词。午饭过后 周恩来同包瑞德、谢伟思进行了交谈。

周恩来先转达了毛泽东对观察组的问候，然后向包瑞德询问了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具体打算。

美军观察组飞临延安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可以说它是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中共一系列外交努力的结果。

自从抗战爆发之后 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战的旗帜 提出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口号。同时，打破蒋介石的封锁，争取国际反法西斯

盟国的合作与支持，也就成为中共一个重要的外交目标。美国是盟国中的主要角色，同美国直接接触，争取它对中共的承认和支持，是中共这个外交战略目标当中至关重要的部分。

早在 1941 年 6 月德国进攻苏联的时候，中共中央即提出了要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主张。当时毛泽东提出，中共在外交上的任务，就是要“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1941 年 12 月 9 日 也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 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宣言》。宣言首先指出 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所发动的非正义的掠夺战争，美、英及其他各国起而抵抗，是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战争。宣言特别强调，中国要同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

当时的情形是，国民党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及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军事、经济封锁，致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的真实情况，以及敌后抗战的形势知之甚少；另一方面，则通过他们的宣传机器，进行大量歪曲报道，对中共及八路军进行诬蔑、诽谤，歪曲中共及八路军的形象。

在此形势下，要想彻底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取得国际社会特别是同盟国的支持，首先就要让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了解中共抗战的真实情况。所以，在 1942 年 5 月 周恩来曾代表中共中央向美方提出，希望美国能够派一个观察组到延安参观。

当时正有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到重庆，美国总统助理居里博士也在这里访问。作为中共代表住在重庆的周恩来利用这个机会会见了随团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周恩来向斯诺谈到 中共希望美国军事代表团和美国记者能到延安看一看。

会面中，周恩来随即将一些有关八路军、新四军作战业绩的资料交给了斯诺，委托他转交居里。同时，周恩来还附了一封信给居

里表示中共不论在任何困难条件下都要坚持抗战，反对内战，而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已经牵制了日军在华总兵力的一半以上。周恩来同时提出，为了有效地打击共同的敌人，希望能够得到同盟国提供给中国的援助的一部分。

一个月之后，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中缅战区司令部文职官员约翰·戴维斯前来拜访周恩来。

戴维斯向周恩来提出，希望中共能在侦察日军情况方面给美国提供便利。

周恩来再次建议美国可以派一个军官小组在陕西和山西建立观察站。

就美国方面来说，虽然罗斯福总统并不希望中国共产党壮大起来，但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对中共存在这样一个事实，他不能不给予关注。所以早在1938年的时候，罗斯福便派遣白宫警卫队副队长、海军陆战队上尉卡尔逊以情报官的身份来到边区，专门了解中共及其军队的情况。

卡尔逊是一个颇有正义感的年轻军人，到达边区后，他发现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并不像某些人所宣扬的那样松散而没有教养。相反，这是一支纪律严明、充满生机的队伍。他跟随八路军转战数千里，亲身感受到了这支队伍的英勇顽强，并被他们舍身忘死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

卡尔逊把他的所见所闻写成报告，一封封发给罗斯福，并且开始在公开场合赞扬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

但是，这个时候美国人并没有十分看重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他们的眼里，蒋介石才是唯一可以依赖的。所以，美国人并不愿同中共发生官方交往。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空军突然袭击了美国在太平洋上

的海军基地珍珠港 给美国海军带来灭顶之灾。同时日军还轰炸了威克岛、关岛、马尼拉、新加坡、香港等地 并出兵袭击了在北平、上海、天津的美英军队，英美为之震撼。

在发动这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同时，日本天皇裕仁发布诏书，对英美宣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 美国同日本直接交战 美国顿时面临既要在欧洲同希特勒交手，又要对付东方日军的进攻这样一种两面作战的局面。这对美国人来说当然是非常不利的。

这时 美国人非常迫切地希望能够利用中国的抗战力量 在东方牵制日军 以减少美国的压力。他们希望中国能够起到牵制“大部日军和作为对日本发动有限进攻的基地”的作用。

罗斯福看准了蒋介石。

1941年12月31日，罗斯福打电报蒋介石，向蒋建议成立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由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罗斯福的这个建议使蒋介石沾沾自喜 他知道 这意味着大批的美援将要送到他蒋某人的手上。还在 1941年5月的时候 美国政府就已经宣布中国有资格获得美国的租借援助，但蒋介石还没有得到具体的实惠。

两天后 蒋介石回电 接受罗斯福的建议 同时 他希望罗斯福能派一名美军将领来中国担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蒋介石强调 这个人不一定非要熟悉远东事务 只要有品学、热心就行 最好是名中将。

1942年1月29日，美国陆军部任命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推荐的约瑟夫·澳伦·史迪威中将为中国战区参谋长 同时任命史迪威担任美军驻华军事代表、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滇缅公路监督人 以及在中缅战区中美军司令等要职。

史迪威是一位职业军人。他 1904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步兵

专业，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又回西点军校任教。1921年他受美国军方派遣到中国学习汉语，曾一度在山西美国红十字会所属的筑路工程队任职。1926年他到了天津，担任美国驻天津第十五步兵队的参谋长。1935年调任美国驻华大使馆陆军武官。史迪威在华多年，曾亲眼目睹了从五四运动到‘七七事变’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对中国的情形有一定的了解。再加上他同马歇尔私交甚密，所以成为中国战区参谋长的最终人选。

美国政府对史迪威寄予很大希望，指望他能同蒋介石携手，牵制住日军的主力，缓解美国的压力。史迪威本人也是雄心勃勃，他还没有想到，他的中国之行是凶多吉少。

此时，罗斯福政府制定的对华政策是：“让中国打下去，通过训练她的士兵，补给她的部队，对她的陆军进行空中支援和促进不同政治集团之团结，使中国成为一个卓有成效的军事上的盟友”。

美国人果真开始向蒋介石提供大量援助。

1942年初，美国和英国分别向中国提供了5亿美元和5000万英镑的贷款。中美之间并开始进行有关中国加入租借协定的谈判。

经过多次讨价还价，6月2日，罗斯福与国民政府外长宋子文的谈判最终结束。当天下午，宋子文同美国国务卿赫尔签署了《中美租借协定》。协定规定，美国向中国提供防卫用品、防卫兵力及防卫情报，中国则需协助美国加强其国防，向美国提供有关军事情报。

此后，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同蒋介石达成一项秘密协议，由美国向蒋介石提供90个步兵师的武器装备。

大批的军事装备开始源源不断地送到了蒋介石的手上。

而此时，蒋介石的心思却并不在抗日方面。美国军援的相当一部分被他用来围剿共产党八路军，而抗日的正面战场则战绩不佳。这就使美国人产生了一种担心，仅仅依靠蒋介石能否实现美

国所希望的战略目标。

史迪威来华后，他本人和他的政治顾问、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戴维斯、谢伟思等人，通过在华长期的观察，了解到国民政府是个腐朽不堪的政权，政治上不民主，军事上消极抗日，经济上贪污腐化，积极反共，已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由此，史迪威等认为，应从美国的战略利益和抗日大局出发，采取联共方针。

为了解中共并与中共建立联系，1944年1月15日戴维斯拟定了派遣美军观察组到延安的计划。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在一份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中指出：

“中国所处的严重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军方处置不当和玩忽职守而造成的。除非中国的一切力量，包括正在对付中共的军队在内，都用来对日作战，中国在战争结束前是不可能起什么作用的。”

此后，约翰·戴维斯在给美国国务院的另一份报告中说：日军在中国最集中的地方是华北，在那里，最团结、最守纪律和最敢于作战的抗日集团是中共。

1944年1月24日，日军大本营下达旨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命令，国民党战场一败涂地，这使美国人受到很大的刺激。

此时美国人已经深切地感到，要想有效地抵抗日本人，仅仅依靠蒋介石一方怕是不行的。美国人感到奇怪，为什么蒋介石有如此多的外援，却那样不堪一击，而中共及其军队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却能迅速壮大？美国军政两界的当权者都很想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及奥妙所在。

基于这种形势，美国陆军于1944年2月向罗斯福提出一项建议，希望向中国华北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区域派遣观察团，以便了解中共的情况并搜集日军情报。

从美国的战略利益考虑，罗斯福总统对陆军的这一计划表示支持。

2月9日，罗斯福打电报给蒋介石，征求蒋的支持与合作。

蒋介石当然不希望美国人同中共有过多的接触和来往，那样势必会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扩大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并最终影响到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彻底剿灭共产党的计划。但蒋介石又不便断然拒绝罗斯福的建议。

苦思冥想之后，蒋介石给白宫回电，表示欢迎美国派观察员到中国来，但希望他们只到国管区活动，言外之意非常明显，不让美国人到中共解放区去。

罗斯福自然明白蒋介石的意思，其实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

为了迈过蒋介石这块“石头”，罗斯福这时耍了个小手腕。

3月1日罗斯福再次致电蒋介石，先是对蒋同意美国观察员赴华感谢了一番，然后笼统地表示将尽快派出观察员。罗斯福故意没有指明观察员将前往中国哪个地区。

在做蒋介石工作的同时，罗斯福电令美军中缅战区开始着手进行派遣观察组的准备工作。

3月22日，罗斯福再次致电蒋介石。这回罗斯福明确提出美军观察组的目标是延安中共解放区。

读过罗斯福的电报，蒋介石大冒肝火，但又无可奈何。

无奈之下，蒋介石于4月22日回电罗斯福，表示接受美军事观察组前往延安的计划。蒋介石的想法是，先原则上答应下来，在具体实施时再进行拖延。

罗斯福趁热打铁，决定派副总统华莱士访华，给蒋介石施加压力，促成国共两党联合抗日。

6月21日，华莱士取道苏联的塔什干到达重庆，当天即开始同蒋介石会谈。

蒋介石自然明白华莱士的来意，却有意同他兜圈子。他上来先对华莱士在探讨玉米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方面所作的建设性思考和好学不倦的精神表示钦佩。对于华莱士此行的使命，蒋介石表现得没有兴趣。

23 日上午，华莱士同蒋介石在曾家岩蒋介石的官邸举行第三次会谈。

会谈中，蒋介石提出，美国方面应当发表一个声明，要求中国共产党听从国民党政府。美方代表范宣德则提出，解决蒋介石同中共及苏联的关系问题，不应成为派遣美军观察组到华北去的前提。

双方讨价还价，各不相让。

会谈进行当中，华莱士接到罗斯福的一封紧急电报。罗斯福命华莱士要不择一切手段，务必使蒋介石批准美军观察组即刻出发前往中共控制区。

有了罗斯福的尚方宝剑，华莱士谈判的口气顿时强硬起来。在当天下午的会谈中，华莱士首先向蒋介石宣读了罗斯福的信。随即，美方一再追问蒋介石，观察组组成后是否即可启程？观察组能否与美军指挥部进行直接电信联系？观察组是否有权自由行动？

逼到这种程度，蒋介石只好表示原则上同意美军观察组尽快前往延安。

当罗斯福跟蒋介石你来我往地兜圈子的时候，中共方面也在为促成美军观察组来延安进行努力。当华莱士抵达重庆时，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社论，对华莱士的到来表示欢迎，实际上也就表明了中共同美方发展合作关系的愿望。

7 月 15 日，董必武从重庆给延安来电，报告美军观察组赴延安的计划即将实施。

中共中央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做了相应的部署。

在此之前，为了迎接美军观察组的到来，并开展相应的外交工作，中共中央已决定要设立一个专门的外事机构，负责有关的各项事务。鉴于美方是军事观察组，所以中央决定在第十八集团军总部设立中央军委外事组，对外是十八集团军参谋部的名义，由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领导，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杨尚昆任外事组主任。外事组下面设立了联络、翻译、研究和行政四个科，抽调了陈家康、柯柏年、黄华、钟庆发、凌青等参加工作，并聘请马海德担任顾问。

7月26日，毛泽东举行宴会，欢迎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出席了宴会。

宴会当中，叶剑英致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

随后，包瑞德致答词：“我们来是要调查打败日本的办法。你们打仗已经打了七年，对敌人比我们了解得多，所以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如何同他们作战。我们希望，在每条战线上，中国和美国军队都能够为了这个目标并肩战斗。”

8月7日，观察组的第二批成员抵达延安。

8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社论对美军观察组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称这一事件为“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对于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实有重大的意义”。

在社论当中，毛泽东对美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所作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们欢迎美军观察组诸位战友，不能不想到美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光辉成绩，和美国人民见义勇为、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不论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现在都有英勇的美国将士效命疆场，为解放法西斯铁蹄下的人民而流血战斗。在我们中国的抗日战场上，美国亦直接和我国人民并肩作战，

成为最亲密的战友。在这个欢迎美军观察组朋友们的时候，我们向美国政府、人民、海陆空军将士及其英明领导者罗斯福总统，表示衷心的感谢。

毛泽东还特别回顾了抗战以来中国战场的情况，揭露了国民党的抗战不力、腐败无能以及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封锁：

七年以来，近五十万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八千余万被解放了的人民，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奋勇作战。很久以来，事实上敌后战场成了中国抗战的最重要战场。在这里，抗击了在华敌伪全部兵力的六分之五；在这里，几乎一切中国的大城市均被八路军新四军所围困；在这里，大部分的敌占海岸线均被我们控制了。这种情形，一向为盟国朋友所不明了。

……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中外记者团与美军观察组，均先后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延安了。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抗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国民党人说：“国共争论问题是中国的私事”，这不过是国民党人在抗日战争中所犯罪过的一块遮盖布。这块脏布之应该扔到茅坑里去，现在已是中国人外国人的公论了。

美军观察组的日常活动由延安交际处负责。当时延安懂英文的人不多，有外事经验的干部也比较缺乏，中央派黄华、陈家康陪同观察组行动，负责联络和翻译工作。

为了使美军观察组尽可能详细地了解情况，毛泽东等中共领

领导人同包瑞德等进行了多次会谈，同时，安排观察组参观了延安各军政机关和八路军部队。并先后由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副总司令彭德怀、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一一五师副师长兼政委聂荣臻，一二〇师师长贺龙，以及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等高级将领出面，介绍了华北敌后抗战的形势，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事训练和作战情况。

在这当中，有几件事给观察组的印象非常深刻。一是八路军的军事素质和战术水平，二是中共的情报工作，再者就是对日军战俘的改造。

8月24日，观察组驱车来到南泥湾，参观一二〇师三五九旅的实弹射击表演。观察组的人过去同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打过很多交道，相形之下，八路军的装束未免显得有些“寒酸”。但是，随着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的鸣响，子弹、炮弹和手榴弹准确地飞向目标，观察组成员的脸上呈现出惊讶之色。

美国人非常希望通过中共获取有关日本的情报，所以，中共情报工作的效率和能量，是观察组重点考察的内容之一。当美国人发现，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报纸不足十天就到了地处偏远的延安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对中共的情报工作表示钦佩。

在延安，观察组遇到了 150 多名日军战俘。包瑞德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这个数字同被国民政府关在重庆郊外的二十五个相比较，似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美国人发现，这些日军战俘“他们热情地竭尽全力地”为中共工作，对此，美国人深为感叹。包瑞德回忆说：“很可能他们已经完全被脱胎换骨了，他们的改造过程没有花多长时间。”

中共对美军观察组所进行的这一系列的外交活动取得了极好的效果。一份份客观反映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情况的报告由观察组发往中缅战区司令部，并在那里转至美国最高当局。

自打美军观察组到延安，重庆和延安之间建立起的空中航线，加强了中共同外界的联系，一些外国记者纷纷通过这个渠道来延安采访。同时，中共从观察组那里还得到了一些小的援助，包括气象器材、电台等。国民党对延安的封锁基本上被打破了。

对于中共来说，接待美军观察组还有另一个意义，那就是为新中国成立后外交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基础。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是培养、锻炼了一批外交人才，像黄华、柯柏年、陈家康、凌青等，日后都成为新中国外交事业的骨干力量。对此，周恩来曾在 1944 年 8 月 6 日给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组长的王炳南的信中谈到：“你们的努力，有了代价，前途更将无限量发展。……现在延安也有同性质的工作，可是人手不够，尤其熟习英文的人不多，望你们在外也要多多注意储备人才。”

二、毛泽东首晤美国总统特使

1944 年 11 月 7 日下午，周恩来同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一起来到延安机场，迎接由重庆定期飞来的美军飞机。

自从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之后，开通了延安与外界的空中航线，时时有从重庆飞来的飞机到达延安，成为延安一件热闹的事情。

为了做美国人的工作，表示中共的友好姿态，每一次有美国飞机来，中共方面都给予热情的欢迎，周恩来、叶剑英等常常亲临机场。

当周恩来和包瑞德来到机场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人等候在那里了，其中有等待家信和给养的美军观察组成员，也有延安交际处的工作人员和赶来看热闹的老乡。

一阵自远而近的轰鸣从远处的天空传来，引得人们翘首仰望，片刻之间，一架军绿色的飞机已清晰可见，